

彭国忠 著

唐宋词学阐微

——文本还原与文化观照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中国诗学论丛

唐宋词学阐微

——文本还原与文化观照

责任编辑 李海妹 封面设计 孟献辉

ISBN 978-7-81110-397-7



9 787811 103977 >

定价 21.80 元

唐宋词学阐微

——文本还原与文化观照

彭国忠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词学阐微:文本还原与文化观照 / 彭国忠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81110-397-7

I. 唐… II. 彭… III. ①词(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唐代
②宋词—文学研究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4517 号

唐宋词学阐微

——文本还原与文化观照

彭国忠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联系电话 编辑部 0551-5108241

发行部 0551-5107784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责任编辑 李海妹

封面设计 孟献辉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25 千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0-397-7

定价 21.8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自序

在2002年《元祐词坛研究》出版后,我曾一再告诫自己:不要急着出书,先好好读书,多积累一些资料。不想这一停就是6年,其间只编撰、整理校点过几部书,发表过二十余篇文章。读书计划本来就未完全构想好,读书的进程也一再遭到评职称、年度考核的搅扰,断断续续,收效似乎不大。倒是在读书时,为一些材料启发,引起了对宋代词学一些问题的思考,这些问题彼此相关、大体接近,似乎属于同一类型,但又有些差异。少数问题在撰写《元祐词坛研究》时也曾考虑过,但未来得及解决,现在因为得到新的材料,产生新的想法,而一并解决了。于是,在停顿数年后,便有了本书的出版。

1990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留在母校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工作,整日与线装书打交道,同事之间关系融洽,古籍部书库又在老馆五楼上,平日造访读书的人多到古籍阅览室,我们就躲在五楼,要么刻钢板写蜡纸著录书籍,要么量书籍的尺寸订做函套,更多的时间就是一人

边做事边读书,与外界联系甚少。那时,先是参加了刘学锴师、余恕诚师任分册主编的《增订注释全唐诗》3卷的撰稿工作,后加入孙文光馆长《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的编写队伍,所以,忽而唐诗,忽而近代文学,忽而古籍整理,飘移不定。大约在1995年,孙文光老师又介绍我参撰《全宋词评注》,我要评注的宋词中,唯一的“大家”是杨无咎,我从一开始就被杨无咎的姓氏、《逃禅词》的版本问题吸引过去,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姓氏考证、版本校勘上,等到要交稿之时,才有所醒悟。但因为编辑重复约稿,另一人又是先交稿,我耽搁大量工夫做成的《逃禅词》的评注,反而未被接受,只有不重复的其他词家词的评注内容得以进入。

向我们约稿的人,就是邓乔彬先生。他感到过意不去,遂将我撰写的《逃禅词》稿,挑选出一部分,拿到另一部书《全宋词广选新注汇评》中用,后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也曾将《逃禅词》的校勘成果投给《词学》,将《逃禅词》评注稿寄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均未获成功。但因为这次撰稿,我与邓先生就有了接触。1997年,我便考入他的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邓先生成了我的导师,我的专业方向,也由硕士时的偏于唐代文学且以唐诗为主,转向了宋代文学且以宋词为主。读博前,我和刘锋杰先生合编的《豪放词》,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读博期间,《全宋词广选新注汇评》正式出版,《全宋词评注》也校了最后一稿,校

样由北京那边的人顺便带到上海,我和一名同门去火车上取,校完后再寄回北京,可惜到现在尚未出版,也多年未听到她的一点消息了。我们几位师兄弟还参加了邓先生主编的《豪放词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撰稿,我和另一同门与孙文光先生合作出版了《明清词三百首》(黄山书社),与邓先生合撰了《绝妙好词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邓先生采取的培养方式,与我在刘、余二师门下学习时多少有些不同。刘、余二师要我们根据开好的书单,按照顺序读书,规定时间交读书笔记。邓先生要我们按照开列的专题,进行准备,定时间到导师家,或某一特定教室去讨论,每人当场都要发言。我本来就讷言,在古籍部呆了8年,除了与同事、家人交流外,就是和书籍交谈了,所以,考博面试时如果不是导师知根知底,恐怕难以顺利通过。但讨论时不能不发言。我便提前将自己关于某个专题的看法写成文字,发言时基本是“照本宣科”地念。好在一,导师对我未予深究,宽容了我的做法;二,自己准备、思考得还比较认真,所以,虽然文字没有什么华采,但意思基本上还有。这样,渐渐地形成了几篇稍微像点样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发表在《文史知识》上,一篇发表在《上海大学学报》上,后者当年被“人大复印资料”复印,是讨论词学问题的,成为我进入词学专业的第一篇正规的学术论文,从而我也完成了由唐代文学向宋代文学的专业“转型”。在学

位论文答辩以后,我就毕业了,又留在了读学位的母校,做了一名教师,宋词、词学研究成为我安身立命的专业。这期间,我带学生在《豪放词》的基础上,完成了《豪放词一百首》(安徽文艺出版社),整理出版了《张孝祥诗文集》(黄山书社),与胡晓明先生合作整理出版了梅曾亮的《柏枧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杂乱是杂乱了些,但基本未出早年读书、在古籍部工作时所涉及的范围。

回顾十来年的学词经历,旨在说明我学习、研究的大致情况,给自己做一个小结。客观地说,因为理论水平有限,写不来高屋建瓴的宏文;又因为在古籍部工作8年的特殊经历,偏好考证,最起码习惯于从材料入手写文章,所以,思考问题的角度可能与一般学者稍异,成果的获得也较难,写一篇文章往往要读很多材料,写作过程通常比较艰涩,已经出版的成果也多属于注释、整理一类,发表的论文即使不是考证型的,考证的痕迹也宛在。从材料入手,由材料说话,进而发展到回归文本,一切由文本说话,这是个人学术研究的特点,其功过俱在此。本书命名为《唐宋词学阐微——文本还原与文化观照》,文本还原是首要的,也是出发点。个人认为,词学研究可以有多种视角、多种途径,文本还原式的研究,自然也是其中之一,有其存在的理由。于是,关于大晟词派,关于《花间集序》,关于李清照的《词论》、刘将孙的《胡以实诗词序》,甚至《花间集》中的

《女冠子》调下之词，晏殊词的“富贵气象”，张孝祥的生平和创作，辛弃疾绍熙四年的行实和心态，都可以贴合文本发现新文本，进行新的研究。

书名的另一半“文化观照”，就我个人而言，源自读博时的导师启发。当时，邓先生为我们开设了“中国文化建设”的课程，这对我来说，不只是在硕士毕业八九年之后重新听一门系统的课程那样简单，而是如何以一根红线穿起散落珠子的大问题。邓先生理论水平高，宏观通论，许多看似无关的问题，经过他的分析，都出现了内在的关联。这对我启发最大，有时甚至可以用“震撼”来形容。在古籍部8年，我接触的是一本一本的书，思考的是如何查证、考实一本书的版本，完全缺乏整体性与系统性。所以，听这门课时，我特别认真，记笔记、思考，原本不畅的思路也逐渐顺通了。撰写《元祐词坛研究》时，我已认识到佛禅与元祐词坛的关系，虽然没有最终解决，但迫使我以后多留心这方面的资料，多进行这方面的思考，这便有了从佛禅角度观照黄庭坚艳情词，以及研究宋代词学批评中佛禅语源的成果。关于唐五代北宋绘画与词相互影响的文章，更是在拜读邓师《宋代绘画研究》时产生的想法。本来，还思考过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词与《周易》的关系，并有了初步成果，但近来感觉还不够成熟，就撤下去了。导师的方法是对的，导师的修为是高的，但我资质低，接受的有限；我

非常感谢导师的启发和教育,但我书中这部分内容可能存在的不足,却与导师无关,这是必须要交代清楚的。

十余年来,《元祐词坛研究》之外的词学研究成果,基本毕于斯。出版此书,写此段文字以为自序,自作小结,是因为下阶段将转入另外一些专题的研究,并将告别这种著述方式。随着新一天曙光的到来,世界总会有些变化。我期待着,盼望着。

彭国忠

2008年10月5日拂晓于上海

目 次

自序	1
第一章 词体与词派	1
第一节 词文体的成立	1
第二节 宋代隐括体词	9
第三节 大晟词派质疑	32
第四节 论豪放风格	48
第二章 词作与词坛	61
第一节 绘画与词	61
第二节 佛禅与元祐词坛	82
第三节 黄庭坚艳情词的佛禅观照	103
第四节 宋代词学批评中的佛禅话语	125

第三章 词序与词论	147
第一节 《花间集序》:一篇被深度误解的词论	147
第二节 再论《花间集序》	160
第三节 秦观词学思想刍议	171
第四节 李清照《词论》价值重衡	189
第五节 从《胡以实诗词序》看刘将孙的词学思想	206
第四章 词人与词心	224
第一节 《花间集》中《女冠子》词	224
第二节 晏殊词的“富贵气象”	238
第三节 关于张孝祥生平和创作几个问题的考辨	256
第四节 从一通佚书看辛弃疾绍熙四年的行实和心态 ...	286
第五节 稼轩词与江西派诗	291

第一章 词体与词派

第一节 词文体的成立

在中国文学史、词史上，词体的成立有两次：一次是词作为音乐文体的成立，一次是作为文学文体的成立。学界关注第一次词体成立的较多，对第二次成立则相对忽视。

论及词体的第一次成立，学界共守的说法是：词体成立于中唐晚唐之际。正如王兆鹏、刘尊明先生所指出的：

我们可以按照大家已逐渐形成的共识，首先把“词体的成立”确定在中、晚唐之际，因为在这个时期里，以张志和、白居易、刘禹锡、温庭筠、皇甫松为代表的一批词人及相当数量的词作表明，“依曲拍为句”、“由乐以定词”、“因声度词”已成为词的自觉而稳定的创作方式，词的长短句形体特征以及篇制、声韵、格律等形式规则也都日益形成并凸现出来，而且他们的大多数作品都已被稍后的《花间集》、《尊前集》等流行词集所选

录,表明了当时人们对这些作品作为“词”的集合体与文本范例的性质的共同认识。

这段话确定了词体成立的基本标准:一是一批文人词人的参与创作,及相当数量词作品的出现;二是“词”意识的自觉,即“依曲拍为句”、“由乐以定词”、“因声度词”;三是词的长短句体式、声韵、格律等形式规则大体已定;四是文人所创作的“词”,被后世作为词看待,具有文本范例的性质。其中,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是“词”意识的自觉:

词所凭依的每首乐曲,乐句有长短,节拍有急慢,因调而异,各调不同,那么,“依曲拍为句”、“依调填词”,随物赋形,也就自然会句有长短、字有多少了……创作方式即辞乐配合方式的更新与变革,乃是词体出现的一个关键因素与重要机制。“依曲拍为句”、“依调填词”,不仅造成了词的长短句的形体特征,造成了配合同一曲调歌唱的词作大体整齐规范的篇制句段及声韵格律,而且造成了词在内容题材及美学风貌方面的一系列新变化和独特性。^①

“依曲拍为句”,出自著名诗人刘禹锡。其《忆江南》词共二首,分别为: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裊露似沾巾。独坐亦含颦。

春过也,笑惜艳阳年。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

^① 王兆鹏、刘尊明:《词的本质特征与词的起源——词学研究两个基本问题的阐释》,《文学评论》1996(5)。

醉樽前。惟待见青天。

此二词当然极佳，堪称早期词的代表。但重要的不是这两首词，而是它们的题序，其文字为：“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对这13个字，论家理解不一：或以之为标题；或另加“忆江南”三字为词调，而以此13字为词序，或当做题下作者自注。其实，这都无关宏旨，重点在于我们知道它已经显示出中唐时期，有像刘禹锡这样的文人意识到不同的音乐文字，需要配合不同的“曲拍”。任二北先生《唐声诗》上编第四章《歌唱》之十《节拍》指出：“刘禹锡语中‘句’，即句读，并非谓句数，非指《忆江南》五句为拍也。”这里强调的句读，其实就是句式之长短等。所谓乐天春词，是指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好、江南忆、江南忆）三首词。

卞孝萱先生《刘禹锡年谱》，系刘禹锡此作于开成三年（838）。

但一般研究者未留意的是：刘禹锡另有题为《和乐天春词》的作品，题下无自注或题序之类的文字，而这首作品则是整齐的句式，是一首七言绝句：

新妆粉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院愁。

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

同样标题为“和乐天春词”，因为有或无“以《忆江南》曲拍为句”，而呈现出不同的体态形制，这才充分表现出刘禹锡对“词”的自觉。

卞孝萱先生《刘禹锡年谱》亦系此绝句于开成三年。

刘禹锡同时代人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言：“诗……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

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别其在琴瑟者为操、引，采民甿者为讴谣，备曲度者，总得谓之歌、曲、词、调。斯皆由乐以定词，非选词以配乐也。由诗而下九名，皆属事而作，虽题号不同，而悉谓之诗可也。后之审乐者，往往采取其词，度为歌曲。盖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也。”这段话概括地指出了当时配乐文字即曲辞的两种类型：前者属于长短句的曲子词，即歌词、词；后者是齐言声诗，或曰歌诗。这印证了刘禹锡认识的非偶然性、非孤立性。元稹此序后注明了时间，为“丁酉”，即元和十二年（817）。这与刘禹锡撰写“依《忆江南》曲拍为句”8字的开成三年非常接近。也就是说：大致在9世纪的40年代以前，作为音乐文体的词体，已经成立。

词是燕乐产物，没有燕乐，就没有词。故从唐末五代到北宋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词”并不是以独立意义上的文体概念在使用，凡是出现“词”的场合，总是伴随着音乐，或歌唱，或宴会、娱乐，也就是说，这时期的词，还是“歌词”、“曲子词”的简称，首先是作为音乐附属物出现于文学史中。这种情形下的词，通常写作或可以写作“辞”。当然，词还有其他种种异称，如：小词、曲、曲子、诗客曲子词、长短句、乐府、乐府辞、寓声乐府、乐章，等等，但每个名称都有其特定含义和出现的大致时间，其间的差别还是有的。这些名称，虽都有其合理性，但都不是词体独立的名称。

词作为独立的文体，即词体的二度成立，出现在什么时候，实难确定。但人们基本上采纳已故施蛰存先生的说法，认为在南宋以后。施先生曾经指出：

“诗词”二字连在一起，成为一个语词，在现代人的文学常识中，它表示两种文学形式……但是在宋以前

人的观念中,诗词二字很少连用。偶然有连用的,也只能讲作“诗的文词”。因为在当时,词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名称。

.....

从晚唐五代到北宋,这个“词”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固有名词.....

南宋初期,出现“诗余”这个名词,它指的是苏东坡、秦观、欧阳修的这些曲子词。无论“乐府”、“长短句”或“近体乐府”,这些名词都反映作者仍然把它们认为属于诗的一种文体.....

不久,长沙的出版商编刊了六十家的诗余专集,绝大多数都改标集为《××词》,例如《东坡乐府》改名为《东坡词》,《淮海居士长短句》改名为《淮海词》,《清真集》先改名为《清真诗余》,后改名为《清真词》。

从此以后,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的固有名词,“词”这个名词才确定下来,于是有了“诗词”这个语词。^①

施蛰存先生说得很清楚,“词”之独立成一文学文体名词,是因为长沙书商出版词籍时标此名目。而所谓长沙书商六十家的诗余专集,实际就是南宋嘉定(1208—1224)初年,长沙刘氏书商刊刻的《百家词》,其百家细目具在,凡97家(或言92家,盖因《李氏花萼集》5卷,收庐陵李洪、李漳等兄弟5人作品,《南唐二主词》收李氏父子词)128卷,为当时收词集最多的一部丛刻。那么,

^① 施蛰存:《词学名词释义》,中华书局,1988。